

本名張愛玲*

張小虹**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摘 要

本文嘗試從張愛玲 (1920-1995) 的「本名」索隱出發，試圖找出張煥、張允侯、張愛玲、張孟媛、Eileen Chang、Eileen A Chang、Eileen Chang Rhyher 之間的幽微交織，並嘗試藉此帶出兩個對「姓名」系統的批判路線。一是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回看中國傳統命名，凸顯其如何透過「從父／夫姓」、輩譜制度、族譜系男不系女等安排，來鞏固宗法父權的正統、正宗與正當。另一則是以解構主義的角度反思「本名」所帶出的「本我同一」，如何壓抑了「生命一書寫」的將臨。而「張愛玲」作為名字、「張愛玲」作為專有名詞、「張愛玲」作為作家署名的「基進不確定性」，正提供了此兩大批判脈絡的最佳匯集思考點，足以顛覆從文化傳承到文學研究以「正本」、「正名」、「正統」、「正當」所建立的超穩定階序。

關鍵詞：宗法父權，字輩譜，從父／夫姓，女性主義，解構主義

* 此為科技部「張愛玲與宗法父權的裂變」三年期特約研究計畫 (MOST 107-2410-H-002-061-MY3) 之部分研究成果。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ung@ntu.edu.tw

一、乳名與學名

張愛玲 (1920-1995) 本名張愛玲，這句話究竟有何弔詭不當之處？

翻開《張愛玲典藏全集》最後第十四卷卷尾所附的「張愛玲年表」，第一行就明寫著「一九二〇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本名張煥」，跳過數行後便是「一九三〇改名張愛玲」，¹ 白紙黑字，毫無疑義，更遑論各種學術著作、坊間傳記對此「本名張煥」千篇一律的覆述重書。但「張愛玲本名張煥」這個公認欽定的講法，真的有這麼確切無疑嗎？而本文正是要以此張學研究的「基本常識」作為思考的起點，質疑當代博大精深、汗牛充棟的張學研究，難不成都是建立在一個充滿疑義的「根本」或「基礎」之上嗎？如果我們連作家的名字都無法確定，那文學研究究竟該如何開始呢？或是只有當作家的名字真正進入「基進不確定性」² 時，文學研究才得以開始呢？

首先，「張愛玲本名張煥」究竟是誰說的？張愛玲曾說「我的小名叫煥」，³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 (1921-1997) 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也曾說「母親生下我姊姊，小名小煥」，⁴ 張愛玲在給姑姑與弟弟的信件中，也都署名「煥」。張愛玲曾說中國人「一下地就有乳名」，而「乳名是大多數女人唯一的名字，因為既不上學，就用不著堂皇的『學名』」。⁵ 但顯然乳名不是張愛玲唯一的名字，小名煥或乳名小煥的張愛玲，七歲時父親就在家中延師教讀，爾後出洋遊學的母親歸國，更毅然決然不顧遺少型守舊父親的極力反對，堅持將十歲的張愛玲送到上海黃氏小學插班就讀六年級。而下面這段引言恐怕正是大家心目中再耳熟能詳不過的命名由來：

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填什麼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煥，張煥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⁶

¹ 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 14：情場如戰場等三種》（臺北：皇冠文化，2001），頁 247。

² 本文所用的「基進」二字，乃指在「根本」、「基礎」上做變革，乃英文 *radical* 一詞的翻譯，其拉丁字源 *radix* 指向根部。

³ 張愛玲，《流言》（臺北：皇冠文化，1991），〈必也正名乎〉，頁 40。

⁴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臺北：時報文化，1996），頁 51。

⁵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7。

⁶ 同前引，頁 40。

這段文字清楚說明了四件事：（一）「煥」是小名，亦即乳名；（二）「愛玲」是學名，亦即所謂的大名；（三）母親沒有直接將小名登記為學名或參考小名來發想學名；（四）學名「愛玲」乃是母親急就章就其原有的英文名字直接「音譯」過來。

但為什麼可以從小名煥、學名愛玲，搖身一變推論出「張愛玲本名張煥」並在正式入學時改名為張愛玲呢？這恐怕是對既有漢族命名系統的極大誤解與錯用。此將小名當本名、學名當易名（入學時改名）的說法，究竟有何怪異之處呢？且讓我們先簡單考證一下「本名」究竟該以何為「本」、以何為「名」。就「名」作為「稱呼」的擴大解釋而言，漢族命名系統可有乳名、小名、譜名、學名、訓名、表字、別號、戒名、齋名、筆名、藝名、化名、代號、綽號等等，稱呼方式不一而足，而「本名」之所「本」乃「根本」，那在一大堆可有可無的稱呼之中究竟該以何為「本」呢？古代以正式命名的「大名」為本，現代則以公領域「正式的名字」為本，用於戶籍、學籍等文書登記，以作身分辨識之用，為個人所專屬。故在張愛玲的例子中，「煥」是私領域的小名，「愛玲」是十歲時插班入讀黃氏小學時公領域學籍登記的正式命名（亦即「本名」），此兩者可同時並存，「煥」者依舊為「煥」，「愛玲」者便也是「愛玲」，沒有取代、置換或更易之必要，自無改名之說。

我們在此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參照說明。就拿近代中國革命女權運動家秋瑾(1877-1907)為例，其初名閨瑾，乳名玉姑，字璿卿，號旦吾，1904年離婚後留學日本，改名瑾，易字（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鑿湖女俠，筆名鞦韆、漢俠女兒、白萍等。⁷ 故我們可以說「秋閨瑾」本於感時憂國的革命精神與女權意識的覺醒，毅然決然將姓名中蘊含女子內室與傳統婦德的「閨」字去除，改名為「秋瑾」，亦將字由「璿卿」改為「競雄」，以應「尚武時代女性重塑自我的一種風氣」。⁸ 故對真正改過名的秋瑾而言，我們可以說「秋瑾本名秋閨瑾」，因閨瑾乃其原本的正式命名，但我們不能說「秋瑾本名秋玉姑」，因為「玉姑」是非正式的小名，不是正式的大名。雖然在漢字文化圈的命名系統中，往往是先有乳名小名，再有學名大名，但亦不可就時間發生先後的次序想當然耳，就逕自把最初的乳名當成「本名」。「本名」之所「本」指向「正式」命名，乃眾多稱謂之中作為確立不移的

⁷ 陳象恭，《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4；符杰祥，《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臺北：秀威經典，2015），頁72。

⁸ 符杰祥，《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頁72。

「根本」，如果我們不能把「玉姑」當成秋瑾的本名，那我們為何可以毫無疑義地把張愛玲的乳名小名「煥」當成她的本名呢？且又毫不遲疑地將張愛玲的學名當成她的易名呢？

若「本名張煥」的說法不成立，那「本名張愛玲」的說法成立嗎？若我們將「本名」單純當成公領域的正式名稱，那「張愛玲本名張愛玲」倒也勉強可以成立，只是充滿同義反覆的辭廢之嫌。而「本名」另有一個更常出現之用法，乃是建立在與「改名」或「筆名」的相對關係之上，那沒有改過名字的張愛玲、也不是筆名的張愛玲，為何跑出一個「本名」來了呢？張愛玲為何既是「本名」（正式的名字），也不是「本名」（改名或筆名之前原本的名字）呢？換言之，「本名」之所「本」，難道是將確切無疑的「本屬」、獨一無二的「專有」，打散成關係網絡中的差異區辨嗎？（「本名」之「本」不在自身，而在相對於非公領域、非正式的乳名小名，或相對於新採用的易名或筆名。）「本名」的弔詭，會不會正在於「名無所本」（非本屬、非專有）呢？故本文的意圖不是要為張學研究「正本」清源、欽定出真正的「本名」，也不是一番苦心孤詣要為張愛玲「正名」，撥「煥」反「愛玲」，而是想要積極嘗試另闢思考與想像的蹊徑，企圖從最根「本」的「本名」去鬆動當前的張學研究，由「名無所本」來探究「張愛玲」作為名字、「張愛玲」作為專有名詞、「張愛玲」作為作家署名的「基進不確定性」，開展足以顛覆擾動從文化傳承到文學研究以「正本」、「正名」、「正統」、「正當」所建立的超穩定階序。

故本文思考的重點在「不確定性」，不是要以「本名張愛玲」的確定性，來取代昔日「本名張煥」的確定性，也不是一心上下求索去考證、去索隱出張愛玲所有可能佚失的名字，而是企圖回到「不確定性」本身所能開展出的基進思考。目前張學研究中的考據衝動無所不在，但往往乃是為考據而考據，企圖找出隱藏在文字表面之下所謂的歷史真相或真人實事。更有甚者，則把文學書寫當成「鑰匙小說」(*roman à clef*)，以索隱為樂，一一對號入座。本文對張愛玲「姓名學」的探究絕不願耽溺純考據，而是希望藉由表面上對「姓名」的探究，在「性別政治」之中展開「性別政治」的批判思考，要在宗法父權的最細緻操作中，撥「正」（「正本」、「正名」、「正統」、「正當」）反「亂」。換言之，「本名張愛玲」所要探詢的，不再是追根究柢找出「張愛玲」真正的「名字」，而是把「名字」所展現的「名無所本」，放回漢族文化號稱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姓名學脈絡，以探究「姓」、「氏」、「名」、「字」等命名體系在上一個新舊世紀之交所呈現的大變

動與大混亂，並藉此批判兩個緊密相連的系統——「漢字命名」系統與「父系宗法」系統，如何在此大變動與大混亂中依舊倖（姓）存至今，依舊陰魂不散。

二、小名與大名

要論張愛玲的名字，必得先回到張愛玲論名字的那篇精彩散文〈必也正名乎〉。如果「張愛玲本名張煥」的推論最主要的考據來自〈必也正名乎〉，那以下對此「始作俑者」文章的詳盡解讀與延伸，或可說明「本名張煥」作為推論的無稽可笑。收在張愛玲散文集《流言》中的〈必也正名乎〉，乃是以最生動活潑、淺顯易懂的文字，表述中國數千年以降的「姓名學」，從哲學、美學、心理學到文字學，無所不包。然就此早期散文的文字力道而言，多採四兩撥千斤之式，幽默調侃多於嚴肅批判，而字裡行間更出現甚多游移的詮釋空間。文章一開頭，張愛玲便以自己「惡俗不堪」的名字切入，帶出對傳統漢族姓名系統的高度探索興趣。接著她便把「命名」浪漫化為一種「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

舊時代的祖父，冬天兩腳擱在腳爐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取名字，叫他什麼他就是什麼。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記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裏就多了一點六月的池塘的顏色。⁹

在這個祖孫和樂融融的想像畫面中，「光楣」、「祖蔭」與「承祖」所承載的宗法意涵，顯然被六月的浪漫塘色給成功搪塞了過去，故讓我們看到的乃是祖父對孫兒的殷殷期許，透過命名所進行的「小規模的創造」，而非「小農封建宗族意識」的源遠流長。¹⁰ 而此刻祖父為新添孫兒所取的名字，大抵多是孫兒的乳名或小名，又稱童名、兒名、幼名或小字，乃私領域未成年時的稱呼，真正「門楣」與「祖蔭」所象徵子孫後輩傳承父祖與光宗耀族的期許，往往要等到正式命名的「大名」才得以真正實踐，具體而微地鑲嵌在論字排輩的「字輩譜」與家譜登錄的傳統之中，以達父系血緣親合關係承先啟後、敬宗收族的理想。

⁹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5。

¹⁰ 張愛玲的《秧歌》裡確實出現了一個叫「荷生」的鄉下小販，挑著擔子賣黑芝麻棒糖，但也僅是過場人物無足輕重。張愛玲，《秧歌》（臺北：皇冠文化，1991），頁 7。

但男人的小名與女人的小名，卻往往帶出截然不同的文化位階與禁忌。一如張愛玲所言，過去「乳名是大多數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為既不上學，就用不著堂皇的『學名』，而出嫁之後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為『張門李氏』了。關於女人的一切，都帶點秘密性質，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輕易告訴人」。¹¹ 這裡信手拈來的「張門李氏」卻難免啟人疑竇，難不成張愛玲又幽默自嘲地以自己家族史為例，一如〈必也正名乎〉文中毫不避諱地嘲笑父親為弟弟也取了個通俗普遍而毫不具創造性的名字：「回想到我們中國人，有整個的王雲五大字典供我們搜尋兩個適當的字來代表我們自己，有這麼豐富的選擇範圍，而仍舊有人心甘情願地叫秀珍，叫子靜，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¹² 但「張門李氏」真的是在暗指張愛玲的祖母李經璣嗎？李經璣（1866-1912），清末重臣李鴻章（1823-1901）長女，上有兄長經方（過繼）、經述，下有弟弟經遠（早逝）、經邁、妹妹經溥與小弟經進（早逝），李鴻章家族的命名方式在張愛玲祖母李經璣這一代，非常清楚地乃是以「經」字排輩。¹³ 而此處「張門李氏」可能的嘲諷，恐怕正在於祖母李經璣除了乳名之外、明明也有論字排輩的大名，但在「張家族譜」之中也只能落得一個「張門李氏」的地位。不論此「張門李氏」確切所指何人，但都帶出封建時代女人名字的命運，未嫁之前已名存實亡，而婚嫁之後則被徹底削除，只能稱為張門李氏或張李氏，在父姓之前加上夫姓，表示其所從出與其所歸屬，全然「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張愛玲貌似不經意帶出的「張門李氏」，卻可以是對父系宗法下「性別政治」最綿裡藏針的批判。

相對於此「張門李氏」作為時空穿越的附會想像，我們倒是可以認真考據一下張愛玲母親的小名。作為二〇年代摩登留洋的時代新女性，張愛玲母親黃素瓊

¹¹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7。

¹² 同前引，頁 36。

¹³ 馮祖貽，《百年家族：張愛玲》（臺北：立緒文化，1999），頁 14-15，「合肥李氏世系簡表」。然當代眾多張愛玲傳記學者，包括此處所援引的馮祖貽，皆以「李菊耦」名之。若「菊耦」乃李經璣之小字，亦即小名乳名，稱其李菊耦便是將其視為張愛玲筆下只有乳名而無大名、學名的婦女，乃是雙重的至為不妥：稱小名已為不妥，棄學名而稱小名更為不妥。然「菊耦」亦有可能不是小字而是表字，若依古禮「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菊耦」有可能是李經璣成年時父系尊長代其所取的字，那「李菊耦」與「張幼樵」（張佩綸字幼樵）的並用，自可被視為傳統的「以字行」（諱名而取字）。然眾多書中卻以「張佩綸」與「李菊耦」並稱，殊為奇異，但亦可見證當代對傳統中國「多名制」之運作不再熟悉。而《百年家族：張愛玲》對張愛玲家族成員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在於將張愛玲母親的姓名「黃素瓊」（後改名為「黃逸梵」）寫成了「黃素瑩」，乃是將張愛玲母親黃素瓊的小名「瑩」誤植在大名之中。

(1896-1957) 曾採用其英文名字 Yvonne 的音譯，改名為黃逸梵。¹⁴ 而張愛玲的母親也是有乳名小名的，依據張愛玲之弟張子靜的猜測，「瑩大概是母親的小名」，¹⁵ 而其猜測的依據乃是在父親的日記中，瞥見了「瑩歸寧」三個字。誠如張愛玲在〈必也正名乎〉中所言，女人的乳名不輕易示人，「在香奩詩詞裏我們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當著人喚出妻的小名，是被認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嬌嗔」。¹⁶ 想來張子靜是從未聽過父親或其他親友喚母親的小名，故只能依據父親日記中的簡略記載去揣測（張愛玲祖母李經璣的小名或表字菊耦，也是重複出現在祖父張佩綸(1848-1903) 的日記之中）。所以對改過名字的黃素瓊而言，我們可以說「黃逸梵本名黃素瓊」，一如前面所言「秋瑾本名秋閨瑾」，但不宜說「黃素瓊本名黃瑩」，一如不宜說「秋瑾本名秋玉姑」，但為何我們卻一而再、再而三理直氣壯地聲稱「張愛玲本名張煥」呢？

三、字號與筆名

說完了小名與大名，我們接著看看張愛玲怎樣談字、談號、談筆名。〈必也正名乎〉中寫道：

男孩的學名，恭楷寫在開蒙的書卷上，以後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親師可以呼喚。他另有一個較灑脫的「字」，供朋友們與平輩的親族使用。他另有一個備而不用的別名。至於別號，那更是漫無限制的了。買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換一個別號，把那古董的名目嵌進去。搬個家，又換個別號。捧一個女戲子，又換一個別號。本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麼不能隨時隨地跟著變幻的心情而轉移？¹⁷

相對於傳統中多數女人的只有乳名，男人的名、字、號則變化多端。一方面極為嚴謹，像寫在開蒙書卷上的「學名」（在古代考取了功名，就成了「官印」），君親師為之命名，也只有君親師可以喚之，不得亂來。另一方面則有較具補償性的「表

¹⁴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頁 108。

¹⁵ 同前引，頁 52。

¹⁶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7。

¹⁷ 同前引，頁 37-38。

字」系統，男子在親暱的小名與嚴謹的大名之外尚有「字」，可以較為灑脫地在平輩親族與朋友間「以字行」。最放蕩不羈的則是號或別字，因為不論小名、大名或取字的命名權多來自君親師等尊長，只有取號可以完全自己作主、自己擇取。但傳統「以言意託志」的號到了張愛玲的犀利筆下，彷彿成了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鬧劇，可以隨心愛的古董或心儀的女戲子而更迭不已。

當然此段文字的敘述，乃是卡在新舊交替的命名系統與現代戶籍登記制度之間，一字姓單字或兩字名的「姓名」漸形普及，「名」、「字」便合而為「名字」，登記在戶籍、學籍上的「名字」取代了無法登記在戶籍、學籍上的「字」，「表字」傳統因而式微，逐漸走向「單一名制」，而繁複字號的取消，不僅只是字號稱謂煩難、常有錯稱失禮之虞，更充滿君主專制時代封、贈、諡號等封建陋習之遺緒，乃民國共和時代汲汲除之而後快的要務。以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為例，字幼樵，又字繩庵，號蕢齋，名字號齊備，學名與「官印」是張佩綸，同儕或同輩可稱其張幼樵、張繩庵或張蕢齋。到了子輩張志沂（1896-1953），長兄張志滄（早逝）字伯蒼，二兄張志潛字仲炤，張志沂字廷眾、廷重，而其妹張茂淵，則無字無號，亦無法正式進入「志」輩譜的同宗家族世系血緣排序，僅能在姓名第三個字採用「水」字偏旁的「淵」，來相應於兄長們同部首的「滄」、「潛」與「沂」。¹⁸到了孫輩張愛玲、張子靜，則已全然無字無號。

然在嘲笑完古代男性的字號滿天飛後，張愛玲接著把砲火對向現代男性文人的濫用筆名、化名。她語帶嘲諷地說道：

也許我們以為一個讀者看到我們最新的化名的時候，會說：「哦，公羊澣，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用的是臧孫蝦蟆的名字，在 XX 雜誌投稿的時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蓮，櫻淵也是他，有人說斷黛也是他。在 XX 報上他叫東方髦只，編婦女刊物的時候他暫時女性化起來，改名蘭烟嬋，又名女婉。」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記這一切，尚且是希望過奢，何況是個文人？¹⁹

張愛玲此處並未嘗試探究文人濫用筆名、化名的歷史政治或文化背景，也未如周作人在〈現代作家筆名錄序〉中從言論不自由的角度，將筆名化名當成「亡命客的化

¹⁸ 馮祖貽，《百年家族：張愛玲》，頁 12-13，「豐潤張氏世系簡表」。

¹⁹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8-39。

妝逃難」。²⁰ 張愛玲在此處只是以詭笑的方式，儘量找出些冷僻艱澀的字詞加以揣擬，以順接前文中所言「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的膨脹」，²¹ 視現代男性文人筆名的詭變多端，一如古代男性的字號滿天飛，都指向新舊交接時代「名字」作為身分符號系統的大變局。

雖然我們不必進一步考據張愛玲此處嘲笑的男性文人為何，雖然擁有至少 118 個筆名的魯迅 (1881-1936) 恐怕也難逃流彈所傷，但我們還是可以好奇的問一問，沒字沒號的張愛玲有筆名嗎？厲害的張學研究者早已指出，張愛玲確實曾經用過極為少數的筆名發表或翻譯作品，而最先被考據出來、也最為人廣知的乃「梁京」與「范思平」。1950 年 3 月 25 日至 1951 年 2 月 21 日間張愛玲在上海《亦報》以「梁京」為筆名，連載長篇小說《十八春》；1951 年 11 月 4 日至 1952 年 1 月 24 日間，同報同筆名連載中篇小說〈小艾〉。原本從不用筆名的張愛玲，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風向未明中，不用本名用筆名，或許也是一時但求自保的權宜之計。但為何是「梁京」？張愛玲曾告知宋淇，梁京筆名乃桑弧代取，並無解釋，她自己相信「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情調，指我的家庭背景」。²² 但同樣也是張愛玲卻在《餘韻》的〈代序〉（掛名皇冠出版社編輯部，實由宋淇代寫）中解釋道，筆名梁京乃是「借用『玲』的子音，『張』的母音，切為『梁』；『張』的子音，『玲』的母音，切為『京』」。²³ 看來張愛玲難得用筆名，但非得用筆名時也著實考究，一個筆名可同時指涉煊赫舊家聲，又可玩弄「本名」之中的各種切音，好個猶抱琵琶半遮面，成功地讓「梁京」成為既要人認不出、又怕人認不出的「文字謎」。而日後張愛玲也確實在表明曾以「梁京」為筆名撰寫〈小艾〉之時，提到了「張愛玲」作為自己相對於筆名的「本名」：「聽說『小艾』在香港公開以單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來筆名梁京，卻理直氣壯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膽當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聲淚痕』的那位『張愛玲』。」²⁴ 短短一句話兩度氣結，氣原本用了的筆名的中篇小說被換成了本名，更氣直接盜用其本名出書的「那位張愛玲」。

²⁰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苦茶隨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現代作家筆名錄序〉，頁 94-96。

²¹ 同前引，頁 38。

²²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307。

²³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收入張愛玲，《餘韻》（臺北：皇冠文化，1991），頁 6。

²⁴ 張愛玲，《續集》（臺北：皇冠文化，1993），〈自序〉，頁 5。

此外張愛玲也曾以「范思平」為譯者署名，翻譯美國作家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在 1952 年 12 月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待 1954 年海明威獲諾貝爾文學獎後，1955 年 5 月《老人與海》三版時譯者的姓名則改回張愛玲，並在 1954 年所寫的序中言明海明威為該年諾貝爾獎得主。²⁵「范思平」與「梁京」一樣都是相當男性化的筆名，但「范思平」之取名由來，並未如「梁京」一般，得到本名張愛玲的譯者任何補充說明，而學者也把較多的精力放在探討張愛玲中譯美國文學與冷戰結構下美新處的關連，放在張愛玲譯文的優劣與增刪改動處，而未對「范思平」的筆名一探究竟。²⁶但除了「梁京」與「范思平」外，張愛玲的筆名就如張愛玲的遺作一般，還是不斷被熱心的張學研究者發掘出土。陳子善在〈張愛玲用過哪些我們所不知道的筆名？〉中再度揭露，1946 年 6 月 15 日張愛玲曾用「世民」（亦是一個相對男性化的筆名），在《今報》副刊「女人圈」上發表〈不變的腿〉。引發陳子善追查「世民」由來的，乃是 1946 年 6 月 26 日發表在上海《香雪海畫報》第一期的一則文壇消息，署名「春長在」所寫的〈張愛玲化名寫稿〉。陳子善不但考據出《今報》「女人圈」版的編者乃張愛玲舊識蘇青，而非「春長在」文中所謂蘇青的妹妹蘇紅，更將這篇短文〈不變的腿〉當成新出土的張愛玲佚文發表，讚嘆此以「世民」為筆名所寫的散文，乃「張愛玲研究界七十餘年來一無所知的，非同小可」。²⁷但「梁京」、「范思平」與「世民」就是張愛玲「唯三」可考的筆名嗎？套句張愛玲愛說的話「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²⁸若是回到最早提出「范思平」為張愛玲筆名的香港作家劉以鬯之說法，張愛玲的筆名顯然尚有其他。他在 1997 年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中，收錄了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五四遺事——羅文濤三美團圓〉，小說末尾的「作者簡介」中寫道：「張愛玲筆名梁京、徐京、王鼎、范思平等。」²⁹而最新出土的張愛玲筆名則是「霜廬」，張愛玲用此筆名翻譯了毛姆 (M. Somerset Maugham) 1921 年的短篇小說〈紅〉(“Red”)，分別刊登在

²⁵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2009），〈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頁 163。

²⁶ 詳情亦可見陳子善，《張愛玲叢考》（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范思平，還是張愛玲？——張愛玲譯《老人與海》新探〉，頁 94-111。

²⁷ 陳子善，〈張愛玲用過哪些我們所不知道的筆名？〉(<https://cul.qq.com/a/20150621/007509.htm>)，2018 年 8 月 20 日下載。

²⁸ 張愛玲，《流言》，〈自己的文章〉，頁 19。

²⁹ 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1997），頁 309。

《春秋》1948年第五、六期。³⁰ 看來張愛玲筆名的考據與挖掘依舊有戲可唱，恐怕一時間還沒完沒了。

四、不當的名字

然而在談笑風生漢族姓名學與字號筆名的種種繁複之同時，張愛玲從頭到尾都沒忘記要時時調侃自己的名字，但在諸多挑剔中卻更顯一往深情。在處理完張愛玲對漢族姓名學的議論後，此處將回到張愛玲自己的名字，一探其中所可能牽引出的「性別」與「姓別」政治。首先，張愛玲在〈必也正名乎〉中認為一個人的名字至為關鍵，「名字是與一個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個的印象的」，³¹ 而在她心目中所謂「適當的名字」其定義如下：「適當的名字並不一定是新奇，淵雅，大方，好處全在造成一種恰配身分的明晰的意境。」³² 她舉例「茅以儉」名字所給出的寒酸聯想，「柴鳳英」則是一個標準的小家碧玉相，都是漢字名字所能生動傳達的不同意境與想像。

而相對於能與外貌品行、身分搭配得宜的「適當的名字」，張愛玲從〈必也正名乎〉一開頭就抱怨自己名字的「不當」：「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³³ 可見「愛玲」作為「不當的名字」之首樁罪狀，便是太過通俗，不僅張愛玲自言「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與我同名的人有兩個之多」，³⁴ 就連上海的文人也曾因名廢言，質疑「有著這樣名字的女人豈能寫出好文章來」。³⁵ 甚至部分眼紅張愛玲一夕間紅遍上海灘的小報文人，也以誇張其名字的俗氣來報復，「眼前張愛玲有三個，一個是舞女，面孔並不怎樣漂亮，更無籍籍之名，不過是一個桂花阿姐而已」。³⁶ 這些揶揄卻也都坐實了張愛玲的內心焦慮：「為什麼

³⁰ 韋泱，〈聽沈寂憶海上文壇舊事〉(https://whb.cn/zhuzhan/bihui/20150731/34556.html)，2019年8月23日下載。

³¹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35。

³² 同前引，頁36。

³³ 同前引，頁35。

³⁴ 同前引，頁39。

³⁵ 此句出自章品鎮以「顧樂水」之筆名、發表在江蘇南通《北極》半月刊第5卷第1期（1944年9月）的〈《傳奇》的印象〉一文，轉引自陳子善，《張愛玲叢考》，〈揭開塵封的張愛玲研究史〉，頁391。

³⁶ 曼廠，〈三個張愛玲〉，收入肖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61。本文原載於1945年1月4日《大上海報》。

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於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³⁷ 然張愛玲並沒有找出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進行「改名」，也沒有找出一個「煒麗觸目的名字」當成筆名（梁京、范思平、世民都頗為男性化與平易近人），而〈必也正名乎〉最動人之處，便在於張愛玲為自己「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的做法提出了懇切的說明：

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³⁸

此時俗不可耐的名字，反倒成為張愛玲屏除文人矯飾以親近日常生活的自我提醒。

但張愛玲名字的「不當」，不僅來自俗氣的不當聯想，更來自急就章的不當「翻譯」。如前所引，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本名黃素瓊）留歐返國後，堅持將張愛玲送進上海黃氏小學插班就讀，填寫入學證時一時遲疑，匆忙中決定「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換言之，張愛玲不僅小名叫煥，更是從小就有英文名字 Eileen，而所謂的「胡亂譯」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乃是棄中文小名而就英文名，第二個層次則是 Eileen 可譯成艾琳、愛琳、璦霖等各種可能，而張愛玲母親黃逸梵情急之下就以「愛玲」定案，雖然「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³⁹

然證諸 1920 年代時髦洋派的「跨語際」命名或改名風潮，張愛玲母親的「胡亂譯」卻一點都不胡來，而是有跡可循。先從張愛玲母親黃逸梵自身說起，本名黃素瓊，其改名的原因當然不是像秋瑾一般充滿革命與女權意識，也不是像小她幾歲、同樣身為勇敢湖南女子的丁玲一樣，毅然決然廢姓（父姓蔣）易名（本名蔣偉），而是追隨 1920 年代都會時髦女性的腳步，以英文名字的中譯來表達前衛與摩登。張愛玲母親小名瑩，而英文名字則是 Yvonne，「逸梵」正是 Yvonne 的中文音譯，一如「愛玲」正是 Eileen 的中文音譯。⁴⁰ 而這類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名字，更大量出現在張愛玲的小說之中，從早期〈第二爐香〉中的英國女主角「憐細」到晚近《小團圓》中的中國女主角「九莉」，母親「蕊秋」，姑姑「楚娣」，都是明顯的英文名字中譯。

³⁷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9。

³⁸ 同前引，頁 40。

³⁹ 同前引。

⁴⁰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頁 108。

但這樣跨語際的名字翻譯，卻顯然有著清楚的性別差異。以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為例，張愛玲曾在家中一本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劇本《心碎的屋》(Heartbreak House) 的空白處，看見父親的英文題識：「天津，華北。一九二六。三十二號路六十一號。提摩太·C·張」。⁴¹ 可見彼時中上階級的男性亦多洋名，但我們幾乎無法想像張愛玲的父親，可以像張愛玲的母親一樣改名為「張提摩太」，重點不在男性是否不如女性愛追趕時髦，重點在男性名字與女性名字在傳統父系宗法位階上的明顯差異，張「志沂」乃家族「字輩譜」的排字論輩，黃「素瓊」則無，「素瓊」可改，「志沂」不可動。就算有些女性的名字也排字論輩，但在傳統的父系宗法配置上，亦不須也無法繼嗣與承祀，而其姓氏亦將隨婚嫁而變動更易。如前所述，「張門李氏」不僅在姓氏上得加上夫姓，就連原本的名字（不論小名或大名）也一律抹去。在古代「張志沂」能正正式式出現在家譜之上，而「黃素瓊」就算不離婚，最多也只能成為「張門黃氏」或「張黃氏」而已。

而麻煩就出在他們都生在新不新、舊不舊的「現代」，生在舊式漢字命名系統的「多名制」與新式戶籍「單一名制」的矛盾與衝突之中，而在此矛盾與衝突中，更夾雜了新時代「自我命名」、「自我改名」的膨脹快感。畢竟千年以來都是君親師命名，而民國共和之後才帶來了名字「民主化」的誇張過程：「因為一個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個人，父母心目中的他與辦公室西崽所見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離不同。有人喜歡在四壁與天花板上鑲滿了鏡子，時時刻刻從不同的角度端詳他自己，百看不厭。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的膨脹。」⁴² 然而對現代男性而言，「別號」一直是從古到今在正式「名」與「字」之外最浪漫無限制的自我表現，但隨著時代的推移，慣有的字號已被視為封建帝制遺緒而被迫棄置，連取個筆名也要有姓有名，以避開作為別號的嫌疑（如需以「魯迅」取代「迅行」）。但對女性而言，「取名自娛」卻成了千年來首遭的大解放，就如同張愛玲在《小團圓》中描寫到女主角九莉的母親蕊秋：

楚姊又笑道：「二孀有一百多個名字。」

九莉也在她母親的舊存摺上看見過一兩個：卞漱海、卞嬾蘭……結果只用一個英文名字，來信單署一個「秋」字。⁴³

⁴¹ 張愛玲，《流言》，〈私語〉，頁 155。

⁴² 同前引，〈必也正名乎〉，頁 38。

⁴³ 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文化，2009），頁 111。

看來小說中以張愛玲母親為原型的蕊秋，不僅以英文名字 Rachel 的音譯為中文名字，還自我膨脹、對鏡自戀到取了一百多個名字，真可謂載欣載奔、身體力行現代女性首次獲得的自我命名權，雖仍是在不更動姓氏（父姓、祖姓）的前提之下熱烈進行。而張愛玲顯然對這種「自我的膨脹」相當包容，「取名自娛」無礙他人，「雖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我們中國人素來是傾向於美的糜費的」，「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麼不能隨時隨地跟著變幻的心情而轉移？」⁴⁴ 古代男人靠灑脫不羈的別號，現代男性文人靠層出不窮的筆名，而現代女性則不僅可以為自己改名、取名，更可以為女兒命名，在命名作為「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中樂此不疲。由此看來，張愛玲母親在為其填寫入學證時，這個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的兩個字，乃是讓張愛玲從入學正式命名的那一刻起，就加入了現代女性的自我命名潮。此「不當的名字」不僅只是俗氣，不僅只是從洋名音譯過來，更重要的乃是由母親命名，而非傳統的父輩命名。此「不當的名字」之可親可憫，不僅在於柴米油鹽的日常羈絆，不僅在於跨語際翻譯的靈活運用，也不僅在於能逃逸於傳統漢字命名系統的僵化，更在於母親對女兒讀書求學的期許，沒有排字論輩，沒有「光楣」或「祖蔭」所承載的宗族重擔，只有透過英文名字的中譯所打開獨立自由的新世界想像。正如張愛玲所言：「我之所以戀戀於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⁴⁵

五、英文的名字

既然張愛玲中文名字的取名由來是英文名字 Eileen，那張愛玲的英文姓名理所當然就該是 Eileen Chang，但只有一個正式中文名字的張愛玲，卻有好幾個不同的正式英文名字。1939 年張愛玲在香港大學入學的英文申請表上，姓名欄填寫的是「Eileen Chang 張愛玲」，父母或監護人欄原先填寫的是 Mr. K. D. Le（李開弟，張愛玲在香港大學就讀時的監護人，後於 1978 年與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結婚，成為張愛玲的姑丈），後來劃去重新填上 Miss Yvonne Whang，將母親黃逸梵以英文姓名與小姐的稱謂（已與張愛玲父親張志沂離婚）帶出，可見張愛玲在中國時期的英文名字，一直是 Eileen Chang。⁴⁶

⁴⁴ 張愛玲，《流言》，〈必也正名乎〉，頁 38。

⁴⁵ 同前引，頁 40。

⁴⁶ 以下所討論到的表格與證件，主要以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網路上公布的原件照片為主，除

而 1955 年張愛玲以中國專才難民資格赴美，在美國移民「綠卡」上填寫的姓名則是 EILEEN A CHANG，入境日期為 1955 年 10 月 22 日，地點為三藩市（舊金山）。⁴⁷ 與原本的英文姓名比較，顯然多出了一個縮寫字母 A，那以 A 作為首字母的名字究竟為何？照常理推斷，應該為「愛玲」二字的英譯 Ai-ling，而這個推斷也因《張愛玲私語錄》的出版而獲得證實。1955 年 10 月 25 日張愛玲在寫給鄭文美的信上，詳細敘述了她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油輪 (SS *President Cleveland*) 從香港經日本到美國的經過。

那天很可笑，我正在眼淚滂沱的找房間門牌，忽然一個人（並非 purser）走來問「你是某某嗎？305 號在那邊。」當時我也沒理會這人怎麼會認識我，後來在佈告板上看見旅客名單，我的名字寫著 Eileen Ai-Ling Chang，像 visa 上一樣嚙嚙。船公司填表，有一項是旅客名單上願用什麼名字，我填了 E.A. Chang。結果他們糊裏糊塗仍把整個名字寫了上去。我很 annoyed——並不是不願意有人知道我，而且事實上全船至多也只要一兩個人知道，但是目前我實在是想 remain anonymous。⁴⁸

由此段的通信內容可得知，張愛玲在入美簽證上用的是 Eileen Ai-Ling Chang，在到達美國所填寫的移民「綠卡」上用的是 Eileen A Chang，一個將「愛玲」的英文拼音全部寫出，一個則是採首字母縮寫，但無論如何張愛玲赴美前後正式文件上的正式英文姓名，已經在原有 Eileen Chang 的名與姓之間，加上了 Ai-ling 或簡寫為 A 作為「中名」（中間的名字），亦即英文的 middle name。

一般而言，在中文姓名轉英文姓名的慣例中，多將原本的中文名字用英文拼音轉換為「中名」，亦即「英文名字+中文名字的英文拼音或英文拼音首字母縮寫+中文姓氏的英文拼音」，而成為符合英文姓名 given name (+middle name) +family name 的慣用法。但在表面上完全符合此中英姓名轉換規範的 Eileen Ai-Ling Chang，卻又是如此的弔詭怪異，Eileen 依舊是 Eileen 作為名，Chang 依舊是

非另有標明紙本出處。此表可參見宋以朗，〈張愛玲美國長者卡、公民入籍證照片曝光（圖）〉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9-26/2555311.shtml>)，2020 年 4 月 20 日下載。

⁴⁷ 證件照片可參見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209。

⁴⁸ 張愛玲、宋淇、宋鄭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文化，2010），頁 146。《張愛玲私語錄》在編輯過程中，編者宋以朗為體貼不諳英文的讀者，在信件中使用到英文字的地方，皆補上該字的中文意譯，放入括弧緊隨英文字後，不免造成閱讀上的困擾，故在引文中將後來加上的中文解釋暫時刪去，以呈現原始通信內容。

Chang 作為姓，但 Ai-ling 卻成了中文名字「愛玲」的英文拼音。若「愛玲」本就從 Eileen 而來，現在卻要將「愛玲」倒翻回去成為英文拼音的 Ai-ling，更讓張愛玲正式的英文姓名，產生發音上的詭異重複。Eileen 就是愛玲，愛玲也是 Ai-ling，但 Eileen 不是 Ai-ling，所以需要一前一後分別寫出，最後才擺上姓氏的英文拼音 Chang。此畫蛇添足之舉，恐怕是張愛玲母親黃逸梵當時「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所始料未及的，為了時髦為了方便，直接將英文名字轉換為中文名字，但真正到了必須進入美國作為英語國家時，或為了官方正式文件的慎重或要求，或為了不被視為美國出生長大、只有英文名字而無中文名字的華裔，硬是讓中文名字來自英文名字的張愛玲，再次將中文名字轉換成英文拼音，落得英文姓名中 Eileen 與 Ai-ling 的尷尬重複。

而 Ai-ling 的消失不見，則發生在 1956 年 8 月 14 年張愛玲與賴雅 (Ferdinand Maximilian Reyher, 1891-1967) 結婚之後。婚後的張愛玲冠夫姓，入籍美國的正式文件上姓名欄為 Eileen Chang Reyher，此亦成為日後張愛玲在美國所有正式文件上的簽署。此時 Ai-ling 或 A 作為中名已消失不見，張愛玲「父姓」的英文拼音 Chang 變成了中名，擺放在「夫姓」Reyher 之前。而根據《宋淇傳奇》的說法，張愛玲後因多次搬家而遺失了美國公民身分證，然在請求美國政府補發時，卻得到「查無此人」的結果。「多番困擾後才發覺政府工作人員在查找『愛玲·張』，而她記錄上的正式全名應是『愛玲·張·賴雅』。」⁴⁹ 此項說法可在張愛玲重新提出補發美國公民身分證的申請書上得到證實。此補發表格填寫於 1991 年 5 月 15 日，申請人欄填寫 EILEEN CHANG REYHER，1960 年入籍美國歸化證件上的姓名為 EILEEN CHANG/REYHER，1955 年入境美國證件上的姓名為 EILEEN A CHANG。⁵⁰ 而後張愛玲在過世之前的所有正式文件，包括補發的公民身分證、加州長青身分證 (senior citizen identification card)，甚至張愛玲立於 1992 年的遺囑，出現的都是 Eileen Chang Reyher，而張愛玲過世後的相關正式文件，包括死亡證明書、火化授權書，出現的也都是 Eileen Chang Reyher。

然那弔詭怪異的「中名」Ai-ling，卻似乎從未真正徹底消失過。1965 年 12 月 31 日張愛玲在寫給夏志清的信上提到，「有本參考書 *20th Century Authors*，全一家公司要再出本 *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借此講有兩部小

⁴⁹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207。

⁵⁰ 此申請表格的影印本可參見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收入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臺北：皇冠文化，1996），頁 46。

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他們不會用的——一共只出過薄薄一本書。等退回來我寄給你看」。⁵¹ 而這本參考書一直拖到 1975 年才正式以《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二十世紀作家簡介補冊》(*World Authors 1950-1970: A Companion Volume to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問世，書中 959 位作家中，僅有三位有中國背景——張愛玲、韓素音與黎錦揚，而他們所採用的英文名字都頗為有趣。以《花鼓歌》(*The Flower Drum Song*, 1957) 走紅的黎錦揚，乃是以 LEE, C. Y. (CHIN-YANG LI) 的作者姓名出現，LEE, C. Y. 只給人華裔或亞裔美國人的聯想，而 CHIN-YANG LI 則清楚帶出原本的中文姓名。而“HAN SUYIN” (pseudonym of Elizabeth Comber) 則較為複雜，本名周光瑚，父親中國人，母親比利時人，英文名字為 Rosalie Matilda Kuanghu Chou，後冠夫姓 Comber，改為 Elizabeth Comber。此本世界作家簡介自是相當重視作家的族裔與文化背景，此二例除了英文自我簡介外，作者的中文姓名拼音（黎錦揚之為 CHIN-YANG LI）或是作者的中文筆名拼音（韓素音之為 HAN SUYIN），都成為舉足輕重的身分辨識關鍵，而張愛玲的麻煩恐怕正在於她的英文「名字」就是她的中文「名字」。於是張愛玲的英文自我簡介，乃是用了 CHANG, EILEEN (Chang Ai-ling)，看來 Eileen 還是必須依賴 Ai-ling，從英文 Eileen 翻譯成中文愛玲、再從中文愛玲翻譯成英文 Ai-ling，才得以雙重釐清張愛玲的中國人身分，既有中國人的姓，又有中國人的名，沒有華裔或混血的疑義。⁵²

六、新出土的名字

由 Eileen 到愛玲，再由愛玲到 Ai-ling，兜兜轉轉，我們大抵應該已交代清楚張愛玲名字的由來與各種變化轉換，從小名煥到學名愛玲，無字無號但有幾個筆名可考，連可能的英文名字都已詳查一番。然而 2016 年最新出土的張愛玲未完稿〈愛憎表〉，卻向我們拋出了一個新的挑戰，讓張愛玲的名字「疑義」繼續「邊譯」，沒完沒了。原本在 2009 年出版的《小團圓》中就已點出張愛玲有另一個學

⁵¹ 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頁 36。

⁵² 三例依序參 John Wakeman (ed.), *World Authors 1950-1970: A Companion Volume to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New York: H. W. Wilson, 1975), pp. 847-848, 612-614, 297-299. 張愛玲英文自我簡介的內容與中文翻譯，可參見高全之，《張愛玲學》（臺北：麥田出版，2011），〈張愛玲的英文自白〉，頁 405-414。

名的可能，只是彼時乃是鑲嵌在小說女主角九莉與姑姑楚娣的對話之中，一閃而過。

乃德一時高興，在九莉的一把團扇上題字，稱她為「孟媛」。她有個男性化的學名，很喜歡「孟媛」的女性氣息，完全沒想到「孟媛」表示底下還有女兒。一般人只有一個兒子覺得有點「懸」，女兒有一個也就夠了，但是乃德顯然預備多生幾個子女，不然怎麼四口人住那麼大的房子。

「二叔給我起了個名字叫孟媛，」她告訴楚娣。

楚娣攢眉笑道：「這名字俗透了。」⁵³

小說中的父親乃德為女兒九莉在團扇上題字「孟媛」，九莉不察箇中原委而兀自高興，反倒是姑姑楚娣嫌題字俗氣。就傳統「伯（孟）仲叔季」作為兄弟姊妹長幼排行的次序而言，「孟」乃「列為首位」，「孟媛」就是大美女、大女兒，此亦九莉後來才理解到父親「顯然預備多生幾個子女」。而姑姑楚娣之所以對此嫌棄，恐不僅是因為「孟媛」二字太顯通俗，怕也是對「伯（孟）仲叔季」的老式排行心有不屑。而九莉之所以歡喜，乃是因為「孟媛」有女性氣息，不像她的學名那麼男性化，至於這個「男性化的學名」究竟為何，小說之中並未交代。

但到了〈愛憎表〉，同樣的段落描寫已從小說的第三人稱，轉換為散文的第一人稱，驗證了張愛玲父親確曾以「孟媛」為其取「字」（一般而言「字」多為父輩所取，而「別號」則為自取）。但在張愛玲字孟媛的同時，張愛玲那神祕的「男性化學名」也一併呼之而出。

「叔叔給我取了個名字叫孟媛，」我告訴我姑姑。不知道是否字或號，我有點喜歡，比我學名「允侯」女性化——我們是「允」字排行，下一個字「人」字邊。

我姑姑攢眉笑道：「這名字壞極了。」

給她一說，我也覺得俗氣，就沒想到「孟媛」是長女，我父親顯然希望再多生幾個兒女，所以再婚後遷入一座極大的老洋房。⁵⁴

⁵³ 張愛玲，《小團圓》，頁110-111。

⁵⁴ 張愛玲，〈愛憎表〉，《印刻文學生活誌》，155（臺北：2016），頁13-14。

此處我們無須驚訝於上下兩段引文的大同小異，〈愛憎表〉本就改寫自《小團圓》。完稿於 1976 年的《小團圓》因諸多考量而決定不出版後，一直束之高閣，張愛玲在八〇年代末開始將「小說」《小團圓》，慢慢改寫為「散文」《小團圓》，先是完成了《對照記：看老照相簿》出版（亦曾一度被張愛玲命名為《小團圓》），而原本只打算作為《對照記》附錄的〈愛憎表〉（也曾一度被張愛玲命名為《小團圓》）決定獨立成文，只可惜在張愛玲生前未能完稿。然這未完成的〈愛憎表〉卻給出了一個我們研究「張愛玲」姓名學前所未見的新訊息：張愛玲的學名「允僕」。若按文中所言「我七歲那年請了老師來家教讀」，⁵⁵ 想來早在張愛玲十歲插班進黃氏小學前，張愛玲其實已經有了學名「允僕」。

我們當然可以問：為何張愛玲過去從未透露父親曾為她取過學名「允僕」？為何回憶起母親幫她填寫入學證時，只提「我的小名叫煥，張煥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母親知道她已有學名「允僕」嗎？還是母親故意不參考小名，也不用父親取的學名呢？張愛玲戀戀於她惡俗不堪的名字，卻為何在此之前絕口不提這「男性化的學名」呢？但我們更想問的是：為何是「允僕」？而「允僕」的出現將如何改變我們對張愛玲「性別政治」的理解？「小煥」、「允僕」、「愛玲」、「孟媛」究竟有何不同？首先，「允僕」由何而來？從張愛玲提出的解釋觀之，當是從「字輩譜」而來：「我們是『允』字排行，下一個字『人』字邊」。如前所述，張愛玲家族在論字排輩上十分講究，不僅男女都排行，二字名中一字遵循「字輩譜」，另一字則用同偏旁。如張愛玲祖輩的張佩經—張佩綸—張佩絨—（張佩縈，女，不列入家族世系表）—張佩緒—（張佩紉，女，不列入家族世系表），以二字名中的第一字「佩」排輩，並同時加以第二字的「糸」字部的同偏旁。張愛玲父輩的張志滄—張志潛—張志沂—張志潭—張志澂—張志浩—張志淦—張志洪，皆以二字名中的第一字「志」排輩，並同時加以第二字「水」字部的同偏旁。而其中最為奇特的，乃是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茂」沒有加入「志」字輩的排行，「淵」卻加入「水」字部的同偏旁。若將她的名字與她的五姑姑張佩縈、七姑姑張佩紉相比較，顯然張茂淵父輩乃無分男女皆以「佩」字排行，也無分男女再加以另一字的同偏旁，為何到了張志沂、張茂淵這一代就改了規矩呢？或張茂淵另有其他的名字嗎？但就目前出現的資料而言，我們尚無法進一步揣測推想。

然張愛玲學名「允僕」的出現，卻再一次證實豐潤張家排字論輩的慣例，女兒一樣以「允」字加入排行，一樣在下一個字強調「人」字部的同偏旁。於是張愛玲

⁵⁵ 同前引，頁 6-7。

的小名「煥」變成了「僕」，小名「小煥」變成了學名「允僕」（雖然依舊是「噲噲地不甚響亮」）。但如此一說，不僅讓人更為疑惑張愛玲姑姑張茂淵的「茂」字所由何來，也更讓人疑惑張愛玲弟弟張子靜的「子」字與「靜」字又所由何來。「子」既非「允」字排行，而「靜」又沒有「人」字部的同偏旁，然張愛玲父親張志沂斷不可能如此重「女」輕「男」，讓女兒加入論字排輩，而將兒子摒除在外。其中的蹊蹺究竟何在？若我們回到目前所依據的「豐潤張氏世系簡表」，張志沂之子張子靜乃是與其兄張志潛之子張子美、張子閒一樣，姓名中的第二個字都是「子」，難道張愛玲、張子靜這輩乃是以「子」字而非以「允」字排行嗎？若果真如此，那奇怪的便不是「子靜」而是「允僕」了。

在不排除記憶有誤的狀況之下，我們能替「允僕」解套的方法之一，便是提出同一家族之內男女不同排行的可能。以前面所舉例的秋瑾為例，家中兄妹四人，兄譽章與弟宗章以「章」字排輩，而本名「閨瑾」的秋瑾則與妹妹「閨埤」一樣以「閨」字排輩。⁵⁶ 以此觀之，秋閨瑾改名秋瑾，便不僅只是去除「閨」所帶來的女子內室聯想，更也是一舉去除論字排輩的陋習。故若從秋瑾家族的男女不同排行看來，或許張印塘家族到了張愛玲、張子靜一代，已讓男女分別排行，女子用「允」字，男子用「子」字。然這個說法本身恐不靠「譜」，畢竟證諸張愛玲祖輩與父輩的慣例，論字排輩乃男女無別（除姑姑張茂淵的似無排輩），並未出現過男女不同排字論輩的現象。

那究竟是「允僕」可信還是「子靜」可信呢？還好的是在「豐潤張氏世系簡表」之外，我們尚有更多現代的參考資料可循，可以為張愛玲的學名「允僕」好好考據一番。張愛玲在《對照記》中曾自述：「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個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後來張家也可以算是個大族了。」⁵⁷ 而根據張志洪（即張人駿，張愛玲父親張志沂的堂兄）的曾孫張守中的說法：「張愛玲所說的七家坨，實則應是大齊坨。在京東一帶，村莊的命名方式可謂『百里不同俗』，『坨』是豐潤很有特色的地名，大齊坨世居張劉兩大姓，張氏以耕讀傳家，讀書應舉的人較多。」⁵⁸ 而年逾八十的張守中曾花了三十餘年的時間調查「豐潤張家」的家族譜系，不僅親自走訪豐潤大齊坨故里，更向上回溯到更早的山東省無棣縣大山鎮張家碼頭，並曾在張家碼頭遇到張氏家譜收藏人張洪升，得以親見《張氏家乘》線裝

⁵⁶ 陳象恭，《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頁4。

⁵⁷ 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臺北：皇冠文化，1994），頁46。

⁵⁸ 靜冬，〈漫談豐潤張家〉，《燕趙都市報》，2014年7月13日，第3版。

七大冊，「曾祖張人駿、祖父張允方、父親張象輝」族譜中均記錄在冊。根據張守中編著的《方北集》所提供的家族史資料，可約略整理出「豐潤張家」由其往上數五代的「字輩譜」如下：⁵⁹

- 第十七代 印（張印塘、張印桓等）
- 第十八代 佩（張佩經、張佩綸、張佩紱、張佩綦、張佩緒、張佩紉等）
- 第十九代 志（張志滄、張志潛、張志沂、張志潭、張志激、張志浩、張志淦、張志洪等）
- 第二十代 允（張允言、張允愷、張允亮、張允方等）
- 第二十一代 象（張象昂、張象昶、張象輝、張象昱等）
- 第二十二代 守（張守中等）

由此看來，張愛玲在〈愛憎表〉中所言的「允」字排行確有其事。按輩分而言，第二十代的張愛玲（張允僕）乃第二十二代張守中的（堂）姑奶奶，而與張愛玲同為第二十代排輩的張允言做過大清銀行總監督，張允亮之妻為袁世凱長女袁伯禎，皆是「豐潤張家」第二十代中較廣為人知者。

那當我們可以確認張愛玲的「允」字輩排行後，接下來便有三個問題需要回答，而這三個需要回答的問題，目前卻也都沒有解答。第一個問題，若是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都是第二十代的「允」字排行，那張愛玲的學名是「允僕」，張子靜有另外的學名嗎？「子靜」是表字或別號嗎？如果張「子靜」漏了字輩排行，那為何同輩的張「子美」與張「子閒」也都漏了字輩排行，而同時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用了「子」字排行呢？看來張子靜名字所引發的問題，一點都不下於其姐張愛玲，張子靜可是從小名開始就無法確定是「燧」還是「魁」，更遑論其學名一大名一譜名之間可能的斷裂與分歧。而張子靜是否張子靜「本名」的難以確認，卻讓我們確認到民國初年命名系統的大動盪與大混亂，幾千年漢族穩固的命名系統遭逢前所未有的變革。首先是族譜（家譜、譜牒、家族世系表）的編修與傳承已被視為封建宗法遺緒而逐漸式微甚至斷絕，連同族譜的「輩譜制度」也一併受到動搖，喪失了原本在「命名」上的絕對權威性，二字雙名或一字單名開始與「字輩譜」脫勾，甚至清

⁵⁹ 張守中，《方北集》（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14）。

末民初還出現「毀婚廢家廢祖姓」的無政府與女權運動。⁶⁰ 而更為關鍵者，乃是現代戶籍系統對「單一名制」的推行，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因而表字式微、別號落伍，徹底摧毀了原本的「多名制」（名、字、號等）。故本文所例舉的張愛玲家族絕非特例，而是具體而微展現行之千年的「字輩譜」如何在新舊時代的交接中亂了套，有排行、沒排行或排成什麼行都難以確定，甚至連小名、小字、大名、學名、譜名（族名）、表字、別號都混淆不清。看在守舊人士眼中自是亂世亂象，但在進步人士眼中則又可以是封建宗法終有鬆動與解放的希望。換言之，我們並不真正在乎張子靜的「學名」、「譜名」或「本名」為何，我們真正在乎的是名字本身的「不確定性」，正是新時代所開啟鬆動父系宗法的一個新可能。

第二個問題，既然我們追溯張愛玲最早的學名乃「允僕」，那我們可以說「張愛玲本名張允僕」嗎？如果「張愛玲本名張煥」的說法不成立，乃是因為「煥」是小名乳名，不是大名學名，那我們該如何面對張愛玲這個新出土的「學名」呢？就時間先後順序來說，乳名「小煥」出現最早，「允僕」應是七歲那年延師來家教讀時所取的學名，「愛玲」則是十歲那年入讀黃氏小學時所取的學名，而最後出現的「孟媛」則是父親為張愛玲所取的「字」。若現代意義上的「本名」指的是戶籍學籍等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正式的名字」，而在過去「正式的名字」即大名，而大名又多與學名、譜名相同沒有衝突，那張愛玲的問題便在於她有兩個學名，一個入家塾的學名與一個入小學的學名，前者由父親張志沂所取，後者由母親黃逸梵所取，前者循家族「字輩譜」以「允」字排行，後者則將英文名字 Eileen 直接音譯為中文，前者仍為私領域，後者則屬公領域。換言之，若以現代「本名」的標準看來，登記在黃氏小學入學證上的「愛玲」才是「本名」，而非家塾中所使用的「允僕」。

若張愛玲的學名「允僕」不可以當成本名，那第三個問題便是張愛玲的學名「允僕」可以當成「譜名」嗎？正如本文所一再重複強調的，所有父系宗法的魔鬼，都藏在「命名」的細節裡，而「允僕」作為我們理解張愛玲「姓名學」的最後一個關鍵，正在於其與家譜、字輩譜的直接連結。家譜作為一種表譜形式，乃記載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中國漢族自古相信家有家譜猶如國有國史，國無史無以考興衰，家無譜無以辨世系。而家譜立譜的依據，正是宗族或家族內定的

⁶⁰ 洪喜美，〈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3（臺北：2003），頁 1-30；劉人鵬，〈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清華中文學報》，5（新竹：2011），頁 231-270；陳慧文，〈廢婚、廢家、廢姓：何震的「盡廢人治」說〉，收入丁乃非、劉人鵬編，《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新北：蜆樓出版社，2011），頁 69-90。

「字輩譜」，乃一姓宗族所共有，按系譜取名，又稱族名、譜名，以確定家族世系命名上的輩分序列，亦即所謂的論字排輩，取名字中的一個字作為「字輩」（「行輩」），可以是二字雙名頭一字或末一字，或一字單名的同部首，此乃一姓宗族「奠世系，序昭穆」之關鍵所在。「所謂『字輩』，即代表家族世系輩分的文字。字輩所用的字，一般都是由祖宗或地方博學儒士所選定，並被寫入家譜，具有『法定』的權威性。」⁶¹ 而此遠在漢代就已形成的家族世系命名字輩序列，乃是「中國宗法制社會的特有產物，因之，透過字輩譜，可以認識中國宗法制社會的特有文化心理。例如崇拜祖先的意識，光宗耀祖、揚名顯親的觀念」。⁶² 故千年以來「輩譜制度」一直被視為保證家族血緣秩序永不紊亂的重要依歸，這種序列由祖先確定，後裔按字排輩，一字一輩，世次分明，秩序井然地傳承下去，即使家族分遷各地，支派浩繁，只要能確確實實按字輩譜取名，就可保證同宗血脈的一氣貫通、世系相連。

而「字輩」亦稱「祧字」，乃具體見證並實踐了古代宗法制度（按血緣遠近來區分嫡庶親疏的等級制度，並以嫡長繼承的父系家族組織來鞏固封建統治），如何過渡並延續到後來以「宗祧繼承」、祖先崇拜為中心的宗法家族結構。父宗曰宗族，「以父宗而論，則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後裔，都屬於同一宗族團體，概為族人」。⁶³ 然「宗祧繼承」系男不系女，自然造成女性在族譜家譜、排字論輩上的「存而不論」。故「輩譜制度」的同宗血脈是男女有別的，只有男系才是同宗，才是繼嗣與承祀的血脈，即便是有嫡親血緣關係的女兒，也被視為終將由父姓到夫姓的非同宗「異姓」，不入族譜家譜，自是充滿強烈的封建宗法觀念與性別歧視。⁶⁴ 而「字輩譜」的「重男輕女」又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層次。就第一個層次而言，傳統中家族的男性一定要按輩取名，女性則限制不同，有些家族的女性也能按輩取字（如前所舉例的張愛玲祖母李經濤和六姑奶奶李經溥），有些家族的女性則完全被排除在「字輩」之外（如張愛玲母親的本名黃素瓊或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就算部分傳統女性在命名過程中進入排字論輩，但在嫁入夫家後，女人的名字便消失不見，「字輩譜」的納入並不表示男女平等。前文已分析過張愛

⁶¹ 王泉根，《華夏取名藝術》（臺北：知書房，1992），頁113。

⁶² 同前引，頁114。有關中國姓名學（命名制、多名制、行輩制）的文化歷史研究，除了此處所引王泉根《華夏取名藝術》外，亦可參閱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臺北：臺菁出版社，1969）；趙瑞民，《姓名與中國文化》（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2008）；陳建魁，《中國姓氏文化》（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2008）。

⁶³ 翟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2。

⁶⁴ 王慶淑，《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51。

玲筆下的「張門李氏」，就算李經濤能和她的兄弟一樣以「經」字排輩，但論字排輩的李經濤，永遠不可能像其兄弟李經方、李經邁一樣列入合肥李氏家譜，就連其早逝的弟弟李經遠、李經進都在家譜之列，李經濤永遠只能進入豐潤張家的夫家家譜之中成為沒有名字的「張門李氏」。

故回到張愛玲的學名「允僕」是否可為「譜名」一說，若按舊制，不論張愛玲或張允僕都不可能列入豐潤張家的家譜，即便按字排輩的張允僕，也絕難成為列入族譜的譜名。張愛玲在〈必也正名乎〉中用了曖昧調侃的「張門李氏」，五十年後的〈愛憎表〉一筆帶過自己男性化卻依照「輩譜制度」排字論輩的學名，看來張愛玲的「性別政治」從不是敲鑼打鼓扯開嗓子叫罵，張愛玲的「性別政治」總是在表面波濤不驚處暗潮洶湧。張愛玲母親黃逸梵「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之舉，卻是在父系宗法命名系統（小名煥，學名允僕，字孟媛）之外，為女兒意外打開了一個跨時代、跨語際、跨文化的女性空間，「張愛玲」之命名不僅只是如學者所言「這則中英互譯的『正名』軼事，成為她後來譯者角色的預言／寓言」，⁶⁵更是「翻譯」作為逃逸與背叛的想像與政治實踐，「張愛玲」作為譯者—異者—易者—憶者（母親的逸之譯與逸之憶），如何得以打出父系宗法「輩譜制度」雷峯塔之關鍵。

七、當張愛玲遇見德希達

照理說處理完最新出土的張愛玲學名，比較過「張愛玲」與「張允僕」在父系宗法與輩譜制度的叛離與歸順後，「本名張愛玲」的任務應可就此告一段落，但本文在此的添酒回燈重開宴，卻是想要透過當代法國哲學家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引進帶入，讓張愛玲的姓名學考掘得以最終拉到一個哲學思考的層次，亦即從「名字」到「名之為字」（名乃由文字所組成，名即語言）的批判思考。帶入德希達的原因有二：一是德希達乃是當代最愛對自己姓名進行調侃與戲耍的哲學家；二是德希達能從對自己姓名的戲耍，成功擴大到對西方存有論之「本名」(the proper name)（本屬固有之名，專有名稱）的批判思考。而直到本文的後半才帶入德希達的原因也有二：一是張愛玲的綿裡針主要乃針對「命名」作為中國父系宗法的細節魔鬼，而德希達的解構哲學卻缺乏跨文化的精準，亦少跨性別

⁶⁵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頁 160。

的敏感；二是在對張愛玲「性別政治」的詳盡鋪陳後，如何可能展開「名字」本身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 與「重述性」(iterability) 思考，就必須仰賴當代解構主義對「本名」的批判，將重音節由論文標題上的「張愛玲」移轉到「本名」，以便能在避免陷入純粹的名字考據狂熱或推理快感的同時，更擴大「本名張愛玲」的批判與思考戰線。哲學家德希達與小說家張愛玲都已過世多年，不可能在人世相遇，但他們對「名字」的敏感與思索，卻可互通有無、相互輝映，足以產生一次思考強度與美學感性上的邂逅，將本文對中國父系宗法「性別政治」的批判，積極擴展到對「名無所本」、「字無所屬」的哲學思考。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德希達怎樣談他自己的名字。晚張愛玲十年出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猶太家庭的德希達，乃當代最重要的解構主義哲學家，大名享譽國際。但一直要到他發表〈割禮告白〉(“Circumfession”) 時，才真正向世人自我揭露那藏在他名字底下的祕密。文中他告白了他的宗教信仰(而非一向被視為的無神論者)，他也告白了他的「本名」(出生證件上的名字) 乃是 Jackie 而非 Jacques。Jackie 乃德希達父母仿效 1920 年代以卓別林電影《尋子遇仙記》(*The Kid*) 紅遍全球的美國童星傑基·庫根 (Jackie Coogan) 的名字而來，而此「美國名字」更常被當成女性的名字使用，故德希達長大後赴法國求學，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 Jacques，一個更像法國男人的名字，一個更具知性風格的名字。⁶⁶ 而更重要的是，德希達在〈割禮告白〉中還告白了他的「猶太名字」Elie，一個在出生後施行「割禮」時所取且充滿傷痕的名字，一個從未被書寫在任何正式文件之上卻滿溢幽靈的隱藏版名字，隱隱指向他出生前三個月夭折的哥哥與在他之後夭折的弟弟、自殺身亡的朋友 Elie Carrive、猶太先知以利亞 (Élie, Elijah) 和在家族中被稱為 Elie 的叔叔 Eugène Eliahou Derrida 等。⁶⁷ 而德希達「美國名字」Jackie 與「猶太名字」Elie 的相繼曝光，揭示了德希達在法國、美國、阿拉伯文化與猶太文化混雜交織中的成長經歷，藏在名字裡的幽靈，以及名字作為揭露與隱藏、在場與不在場的跨文化、跨性別、跨世代曖昧。

唯有透過書寫，我們得以看到在「雅克·德希達」之中，如何不斷裂解開摺出新的名字，無法被收束在「雅克·德希達」所表徵的「存有」與「本我同一」(self-sameness) 之中，美國名字 Jackie 與猶太名字 Elie 的相繼浮出，都成為阻斷

⁶⁶ Benoît Peeters, *Derrida: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2013), pp. 12-13;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325; Jason Powell, *Jacques Derrida: A Biogra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p. 10-12.

⁶⁷ Jacques Derrida, “Circum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p. 185.

「雅克·德希達」作為單一的穩固意義，都是「文本性」(textuality) 的歧異冒現，不可遏抑，無法收束。但精彩的不僅只是德希達對自己名字的告白與反思，更是德希達從名字出發而開展出一系列對「邏各斯理體中心」(logocentrism)、「存有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 最犀利的當代批判。先以德希達所舉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法文大寫的 Pierre 與小寫的 pierre 有何不同？大寫的 Pierre 乃是作為某男性的名字，強調此名對應此人的獨一無二，此男性人名 Pierre 亦即文法上所謂的「專有名稱」(le nom propre)；而小寫的 pierre 乃法文的「石頭」之義，乃屬文法定義下的「普通名稱」(le nom commun)。⁶⁸ 雖然 Pierre 與 pierre 都來自希臘字源 petros (石塊、石頭)，但當小寫的 pierre 可以被翻譯成中文「石頭」、英文“stone”或德文“stein”時，大寫的 Pierre 卻不可以被翻譯成英文的 Peter，如同 Pierre Bourdieu 不會是 Peter Bourdieu 或 Jacques Derrida 不會是 John Derrida 一樣。換言之，「專有名稱」預設了名字與指涉對象之間的同一對應與獨一無二，不具有跨語言的「可譯性」，而「普通名稱」則是事物的通稱，可以被翻譯成各種語言。

為了呼應本文既有的論述脈絡，擬在此將法文的 le nom propre 權宜譯為「本名」，並不時與文法上慣用的「專有名稱」之翻譯產生滑動。其理由有二：一是法文 nom 既是名字 name 亦是名詞 noun，可用「名」表示之；二是 propre 與德希達一再使用的 propriété 乃指「本我同一」，可用「本」表示之。故此處「本名」已不再圈限於前文所強調的「正式的名字」或相對於改名、筆名的「本來的名字」，而終於可以進一步從「名字」擴大到「語言」、從專有、專屬、名有所本擴大到無有、無屬、名無所本的思考。而德希達乃是從最早期著作《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 開始，就將「本名」(le nom propre, the proper name) 視為「邏各斯理體中心」的基石：「本名」作為「本我同一的名字」，預設了「本屬」的特質，專為己有，獨一無二，乃是語言符號與指涉對象之間完美的貼合認同，無法分離，無法翻譯，亦無法置換取代，我的名字就是我，意符就是意旨。而德希達的解構工程，正是要揭示所有的「本名」總已充滿差異書寫的痕跡，總已流變「通名」(普通名稱)，總已是不可譯與可譯之間的「雙重束縛」(double contrainte, double bind)。

故對德希達而言，「本名」作為「本我同一的名字」給出的正是一種兩難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本名」具有「獨異性」(singularity)，凸顯「現下存有」(the present presence)，「詞」(word) 即是「物」(thing) 的合而為一；另一方面「本

⁶⁸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09-111.

名」卻必須在「重述性」中存活，不僅在命名之初就已飽含分類化與書寫化的痕跡，以展現其作為與一切其他「本名」的名義差異 (nominal difference)，更能在主體不在場或主體已逝的情況下持續使用。前者所凸顯的「獨異性」乃純粹的指涉、純粹的不可翻譯，在語言與表義之外；而後者則是對可譯與可讀的要求，由專有名稱流變普通名稱。由此觀之，「本名」既在書寫之外又在書寫之內、既在語言之外又在語言之內、既在可譯之外又在可譯之內，此正是德希達所強調「雙重束縛」的兩難與不確定性。

於是西方「存有形上學」中不可翻譯、不可重述的「本名」，被德希達弔詭解構為必須建立在「可譯性」與「重述性」之上的「本名」。正如德希達在〈本名之戰〉(“The Battle of the Proper Name”) 中所言：「從本名在系統之中被抹去的那刻起，便有了書寫，從本屬消失出現的那刻起，便有了『主體』，亦即從本屬的第一次出現、從語言的第一個黎明。」⁶⁹ 故書寫與主體的出現，正是「本我同一的名字」的解構，不僅我之為我乃透過「命名」，我與我的關係亦踐履於語言的不斷重複陳述之中，名字作為指稱，名字作為標記，都不斷挖空我，將我置放在差異的關係連結之中，讓我不斷「溢出」我，讓我的名字不斷「譯出」更多的名字，讓「本我同一」不斷偏離摺曲為「本我非一」，「『我』乃是最正當與最不當的名字，獨一無二與普世皆同的名字」。⁷⁰ 如果說張愛玲愛自己「惡俗不堪」的名字，乃是因為對母親的記憶與對世俗日常的依戀，那德希達在此提出愛自己名字的理由，則是名字永遠不屬一己所有，德希達永遠無法歸屬於德希達。

而德希達最厲害之處，便是把在哲學思考上對「本名」的解構，放回到對自己名字的戲耍之中，具體展現「名無所本」的語言流變。例如在《格拉斯》(Glas，原義為「喪鐘」) 中大玩特玩姓氏遊戲，像搬弄法國作家惹內 (Jean Genet) 姓氏 Genet 的「不當」，其「不當」不僅是因為出生時父不詳而採用了母親的姓氏，遂被傳統保守社會視為恥辱，更是因為 Genet 與 genêt (植物或花名) 之間的類同連結，創造出 Genet 作為大寫專有名稱與 genêt 作為小寫普通名稱之間的滑動，一如惹內喜用花名來命名角色，亦是讓專屬的姓氏變成了通稱的花名。⁷¹ 而德希達更

⁶⁹ Jacques Derrida, “The Battle of Proper Names,” in Julian Wolfreys (ed.), *The Derrida Reader: Writing Performances*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p. 75. 本文英文引文之中譯皆為作者自譯。

⁷⁰ Barry Stocker, *Jacques Derrida: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96.

⁷¹ Jacques Derrida, *Glas*, trans. John P. Leavey, Jr. and Richard Rand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 34b.

是大量拿自己的姓氏來耍弄，例如“derrière les rideaux”。⁷² 德希達將自己的姓氏 Derrida 藏在 derrière 與 rideaux 之中成為顛倒字母排列的字謎 (anagram)，而“derrière les rideaux”之義也正是「在簾幕（面紗）之後」，既呼應該文乃是德希達對剛過世父親的悼亡，讓父親的姓氏藏在文字的簾幕（面紗）之後，也同時呼應德希達對「真理作為揭示」(aletheia, unveiling) 的批判思考。此亦為何美國後殖民學者、德希達重要的譯介者史匹娃 (G. C. Spivak)，會將《格拉斯》一書讀成德希達的「祭祖儀式」(an ancestral rite)。⁷³ 她指出德希達自己的父親加上黑格爾 (G. W. F. Hegel) 與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乃書中最主要的三位祖先，而德希達乃是在「d 字母起首的字詞殘骸」(the debris of d-words) 之中上下求索，變化出各種小寫化、音素化 da 的文字捉迷藏，而讓帶有自傳性質的《格拉斯》成為「失去名字的永恆悼亡」。⁷⁴

但德希達不論是自曝美國名字與猶太名字或透過文字遊戲去解構自己的姓氏，其所念茲在茲的乃是所有的「本名」都無法逃脫其在語言關係網絡中的差異流變。而這些思考背後最主要的關鍵人物（史匹娃所謂的「祖先」）之一，正是以「同名面具」(homonymic masks) 撼動整個西方哲學史的尼采。尼采徹底抨擊「本名」結構中獨一無二的真確性、固定性與對應性，他是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是凱薩大帝、亞歷山大大帝，他是 Zarathustra，他是華格納 (Wilhelm Richard Wagner)，他是酒神也是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作為哲學家的「本名」，喪失了任何可能的整體一致性，「本名」所預設的「當下顯現」(the presence of the present)，已徹底被差異系統所鬆動、被關係連結所牽扯，無法就其位、司其職。這裡並不是預設在多重「面具」(persona 最早即為祖先的蠟製面具) 之下或複數的流動認同之後，存在著一個獨一無二、永恆不變的尼采，此仍是人本主義透過「本名」對單一確切主體的預設，這裡的「面具」乃指向抹去本名之後才出現的書寫主體，不斷以分裂增生的「同名面具」來回應生命的複雜糾葛，不斷以真實與偽裝之間的弔詭循環來啟動自我（作為透過語言的「字」我）呈現，一個永遠無法確實掌握身分認同與屬性、永遠無法「如實呈現」的「字」我。

⁷² Ibid., p. 84b.

⁷³ G. C. Spivak, “Glas-Piece: A Compte Rendu,” *Diacritics*, 7.3 (1977), p. 22.

⁷⁴ Ibid., pp. 23-24. 曾有不少學者質疑德希達的「姓名遊戲」乃是刻意行之，德希達的回應則是強調「本名」邏輯的本身就會啟動名字的遊戲，見 Jacques Derrida,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p. 76.

而德希達在《他者之耳》(*The Ear of the Other*) 中的〈耳傳記：尼采教誨與本名政治〉(“Otobiographies: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 章節，更透過對尼采自傳《瞧！就是這個人》(*Ecce Homo*, 1888) 的解讀，嘗試拉出哲學文體 (corpus) 與生命傳體 (body) 之間的巧妙連結，提出了在解構本名的實踐之中，如何有可能重新看待作家的「署名」(signature)，如果名無所本、本無所屬，那「作家署名」又代表了什麼？對德希達而言，「作家署名」乃是作品與生命之間的動態界限，乃是「本名尼采」的邊界標記，等待一個聆聽的耳朵，經由溝通而得以被聽到、被讀到。「署名」一如「本名」，讓尼采在尼采死後還是以尼采之名被重述之，讓尼采無法被固置標定為一家之言，讓尼采永遠無法外在於書寫，也讓尼采永遠無法成為尼采作品與傳記的最初唯一源頭或最終唯一依歸。

八、「本名」的跨性別翻譯

而我們「繞道」德希達對「本名」、「署名」的長篇哲學大論後，究竟能對「本名張愛玲」的思索提出任何新解呢？但在一探德希達的解構本名思考如何有助於我們重返張愛玲之前，我們應該先看看女性主義對德希達的可能批判與張愛玲對德希達的可能提點。誠如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在《攸關身體》(*Bodies That Matter*) 中所言，當代對「本名」的哲學思考充滿了男性中心的自以為是與異性戀架構的預設，因而避談「父姓（祖姓）」，避談「本名的運作」即是「父姓的運作」。⁷⁵ 而「父姓」之所以可以世代代綿延接續，關鍵便是透過婚嫁儀式交換女人，讓女人從「父姓」轉變為「夫姓」，女人姓氏的可變性，如是造就了「父姓」的永續性。巴特勒反諷男性哲學家要如此大張旗鼓、大費唇舌，辯稱「本名」的「本我同一」(propriety) 實乃「本我非一」(non-propriety)，乃是根本看不到女人自始至終的「本我剝奪」(expropriation)：「本我剝奪乃女人的認同情境。認同的獲取正來自姓名的轉換，姓名作為轉移與置換的地點，姓名總是如此暫時，差異於自身，滿溢出自身，非一自我一同一。」⁷⁶

此處巴特勒對德希達的批判火力，乃聚焦於德希達的避談「姓氏」（祖姓、父姓、夫姓），而德希達之所以避談「姓氏」，不僅只是因為法文的特殊表達（法文

⁷⁵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3), p. 154.

⁷⁶ *Ibid.*, p. 153.

的 *nom* 既指名也指姓，而 *surnom* 則為暱稱，不同於英文的 *surname*，而較近 (*nickname*)，更是德希達意圖將法文 *surnom* 拆解為 *sur-nom* (*sur-name*, *sur-naming*)，以作為解構「本名政治」的核心操作概念。德希達的 *sur-nom*，乃名字之上、之外、之後所不斷溢出、不斷增補、不斷替代的名字，證諸西方姓名學的發展脈絡，先有名再有姓，姓確實是附加在名字之上、之外、之後的名字。故 *sur-nom* 作為「溢名」或「添名」乃是命名的不斷重複，不僅只是「本名」必須不斷重複與重複命名，更在於最初的命名本身已是一種再命名，「姓」既是一種重複，也是一種遺忘，一個掩蓋 *sur-naming* 本身的不斷重複。換言之，「姓」所承載與具現的父系—父權體系，乃被德希達 *sur-naming* 的語言重複遊戲所拆解無蹤，此亦為何巴特勒要特別強調德希達「本名的運作」，乃是建立在「父姓的運作」之重複與遺忘之中。

故巴特勒乃是從女性主義政治批判的角度，來看當代「純」哲學對「本名」所展開的語言思考與文字遊戲。不需要透過對自己姓名的戲耍或穿插藏閃，女人總已是父權結構（包括父主 *patricentricism*，父系 *patrilineality*，父財 *patrimony*）下的「本我非一」，或雙重的「本我非一」。但相較於中國父系宗法的「命名」系統，一個透過祖先崇拜—宗廟家祠—輩譜制度—宗祧繼承所嚴密交織的千年系統，巴特勒筆下以近現代西方父主—父系—父財共構的父權架構，顯然是小巫見大巫。而張愛玲在自身家族命名的曲折繁複中，或在〈必也正名乎〉的命名考究中，都具體展現了中國父系宗法的嚴密細膩與動彈不得，一個「張門李氏」就足以道盡女人雙重、多重的「本我非一」，一個「愛玲」就足以帶出跨文化譯名的逃逸路徑，一個「允僕」就足以表達漢族命名輩譜分類系統的收納與排除。中國女性只有父姓、只有夫姓、沒有女姓、沒有母姓，即便母親的姓氏也是母親的父姓，即便「姓」字本身乃強烈攜帶了上古母系社會的造字遺跡（上古八大姓皆從女部）。

德希達的解構「本名」，雖有跨文化與跨性（姓）別的敏感缺失，但還是可以對「本名張愛玲」提出兩個關鍵的思考方向。第一個是「本名」二字的跨文化翻譯，如何讓中文的「本」、「名」與當代歐陸哲學對 *the proper name* 的批判思考相連結，以展開名字的「可譯性」與「重述性」。第二個則是作家署名作為「本名張愛玲」的邊界標記，如何得以讓我們重返「張愛玲」作為書寫文本與生命傳記之間的動態界限。首先在德希達解構主義的啟發之下，讓我們先爬梳「本名」在中文可能開展出的「造字」脈絡，並嘗試對「本名」、「名字」、「姓名」的用法提出差異思考的可能。先從「名」開始，許慎《說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从

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⁷⁷「名」在此的造字關鍵有二，一從夕，混沌暗黑或天地晦明中的無法識見、無法辨別；一從口，用自己的嘴巴發出聲音，報出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見「名」之為「名」，所啟動的可以是一系列同音異字的相互轉換：冥—鳴—名—明。從「冥」到「明」的關鍵，在於自「鳴」其「名」。故「名」乃同時兼具「冥」與「明」的背反，無「冥」則不須「鳴」，「名」出則「明」至，唯有冥而鳴之，才能鳴而名之，以臻名而明之。這與德希達所言西方哲學將「名」視為「保留給獨一存有顯現的獨一稱呼」(unique appellation reserved for the presence of a unique being)，⁷⁸ 乃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名」在從夕從口之外，還有一個關鍵詞「自命」，在幽冥晦暗中自稱其名。此處的「自命」當非自己為自己命名，而是自己報出自己之名。「名」之為「呼格」(the vocative case)，「名」之「以口自名」，我口報我名，展現名與我之間的直接身體發聲表達。故「自命」的重點之一在「名」作為語言發聲與「存有」的展現乃同時發生，一如聖經創世紀中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自此光與暗、天與地、陸與海就此分隔，世界不再幽冥晦暗。故「自命」的重點之二便在「自我」與「他者」的同時出現，若幽冥晦暗指向無差異區分的混沌，那「自命」作為最初的語言行動，則是打破混沌進入象徵，開啟人我區隔、差異區分的世界運作。換言之，「自命」乃是「字命」，「自」之弔詭矛盾，正在於「字」之無法「自有」與「自屬」，亦即進入語言後永無專屬、專有、專名之可能。故「自命」的重點之三，則是以黑暗中自己報上名來的場景調度，迴避了命名系統所承載父系宗法、敬宗收族的「意識形態召喚」（「光楣」、「祖蔭」、「承祖」）與輩譜分類系統，亦即「自（字）命」之前「他命」（大寫他者作為語言的象徵秩序）的重複與遺忘。

而本名之所「本」，則如《說文解字》所言「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⁷⁹ 亦即在象形字的「木」（上有枝幹、下有根系）下方中央加上一道線，來「指示」木之「根本」所在。故當我們將作為語言關係網絡中差異區辨的「名」與強調本我固著、自體根植的「本」放在一起時，「本名」就已然出現了矛盾分裂，既以名為本，又名無所本，既凸顯專屬專有，又漂流離散，永遠有一道線所標示出的「正當位置」，也永遠溢出一道線所圈限的「本我同一」。也只有在此「雙重束縛」的兩

⁷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2上，頁31。

⁷⁸ Jacques Derrida, "The Battle of Proper Names," p. 76.

⁷⁹ 許慎，《說文解字》，卷6上，頁118。

難觀照下，我們才有可能從張愛玲的姓名學考據中，拉出有關名字「可譯性」與「重述性」的哲學思考。此處名字的「可譯性」指的不再只是前文所論 Eileen 的跨語際翻譯為愛玲，或愛玲的跨語際翻譯為 Ai-ling，也不再只是小煥—允僕—愛玲—孟媛—梁京—世民—范思平—霜廬—Eileen Chang—Eileen A Chang—Eileen Ai-ling Chang—Eileen Chang Reyher 等各種名字的「逐譯」，而是回到「名字」本身的兩難與置疑：既是形上存有論的「名自」（稱謂自身），也是打破形上存有論的「名字」（名之為字，名乃語言關係網絡中的差異書寫）。「名字」遂成為當代哲學思考中「形上存有學」(ontology) 與「解構文字學」(grammatology) 的終極交鋒。「張愛玲」作為「本名」之兩難，既專屬亦無法專屬，這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同名之累」，尤其是證諸漢字命名系統中同名或同名同姓的高重複率，而是前面所言的尼采「同名面具」，不是筆名、化名、字號的微量或大量使用，而是作為獨異生命在不同時間節點所不斷裂解出的「同名面具」，不再是其所是，不再名我固當，徹底打破「本名」的「專屬邏輯」，而能不斷流變—異者—譯者—易者。因而「本名張愛玲」所開啟的「可譯性」與「重述性」，正在於張愛玲不屬於張愛玲，所有有關張愛玲的「獨異性」，皆出現在一再引述的重複與變化之中，在張愛玲生前如是，在張愛玲身後亦復如是，沒有任何一個張愛玲的本尊或本質可供回歸或膜拜。故在〈私語〉出現之前的張愛玲，不同於〈私語〉出現之後的張愛玲，在蕊秋出現之前的張愛玲，不同於蕊秋出現之後的張愛玲，小名煥的張愛玲，不同於學名允僕的張愛玲，張愛玲作為「本名」的同時，生前與身後皆不斷裂解成重新出土的「同名面具」，不再是其所是，不再名我固當。

然在這層層的解構思考中，我們更不可須臾忘記「張愛玲」之為女性，其「本名」總已展現了一個更根本的雙重「本我剝奪」，由父姓「張」到夫姓 Reyher、由中國到西方之「本我剝奪」。二十世紀英國女作家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曾說「女人無祖國」，若對張愛玲而言，恐怕更根本、更基進乃是「女人無本名」，女人在命名之初，就總已被「本名」所預設的「正當」、「正統」、「正宗」及其所建立的穩定象徵階序排除在外了。張愛玲作為「本名」的弔詭，正在於同時展現了「樹狀張愛玲」與「塊莖張愛玲」的兩難，前者指向父系宗法、輩譜制度，以「家族樹」的系譜想像為原型，後者則指向「性別政治」的逃逸與異質連結的去中心開展，無祖先，無子嗣，無始亦無終；前者指向「張愛玲」作為漢族分類系統的命名，後者則指向「張愛玲」作為書寫文本的差異痕跡。此乃「張愛玲」作為「本名」的雙重「本我剝奪」（命名的「本我剝奪」與性別的「本我剝奪」）與雙重

「本我非一」（生命的「本我非一」與書寫的「本我非一」）。

有了這層層的理解與掌握，我們便可進入到德希達解構主義對「本名張愛玲」的第二個重要啟示，亦即本文最後所欲探究的「作家署名」，如何有可能成為書寫文本與生命傳記之間的動態界限。在當前的張愛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傳記化」、「自傳化」文學文本的傾向，輕者以張愛玲生平傳記資料作為閱讀張愛玲文學文本的比對經緯或參考框架，重者則對號入座，以挖掘考據文學角色的現實對應人物為職志，熱心提供各種角色人物的「對照表」以供參考。其所造成的主要困擾有二。一是方法陳舊，不見新意，固守傳統文學研究對「作家」、「作品」、「反映時代」、「自我經驗」的理解，更往往深陷在作家傳記資料之中難以施展。二是強化了傳統對「女作家」的研究模式，好像只要是女性創作就離不開身體、離不開親身經驗，而重重貶抑了書寫作為女性身體與女性經驗離散流變的可能。因而當前的張學研究迫切需要對「作家署名」進行哲學思考與重新界定，才有可能柳暗花明開展出具當代文學理論敏感度的張學研究，而德希達透過尼采所進行的「作家署名」解構思考，或許正是可以參考斟酌以進而培力的路數之一。

德希達最初的考量，乃是西方哲學傳統中男性哲學家身體的「存而不論」，只談哲學概念，不談哲學家的生命經驗，故德希達一心想找出的，乃是尼采「文體」與「身體」之間的緊密連結。而張愛玲作為女性書寫者，其所面臨的問題正好相反，女性文學家身體的無所不在，幾乎讓所有的文學文本都被當成女作家的生命經驗再現。換言之，尼采作為「作家署名」的重點放在「身體」，而張愛玲作為「作家署名」的重點則應放在「文體」。就其相同點論之，兩者作為「作家署名」，都是在文本上簽署了自己的「本名」，而此「作家署名」在其死後仍不斷被「未來」所簽署，一方面自傳者用自己的名字述說自己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自傳者的當下顯現乃同時指向時間的將臨 (to come)，而書寫文本的開放，乃是朝向他者的訴說，也將由將臨的他者進行會簽，因而尼采並不擁有尼采，張愛玲並不屬於張愛玲。而就其不同點論之，張愛玲作為女性的「作家署名」乃是雙重的「本我剝奪」與「本我非一」，但其重點不在回返「本名」所允諾的烏托邦認同幻象，而是該更加基進化語言書寫作為符號的差異系統，如何讓「本名」不斷「溢出」與「譯出」，讓作為「本名」與「本人」的張愛玲，永遠無法成為張愛玲文本的「最初起源」與「最終歸依」。故張愛玲作為「作家署名」所開啟的「文體」與「身體」之緊密連結，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版本。一是「一切皆自傳」的保守版本，逕自將張愛玲的所有文本，都讀成張愛玲的自傳材料或傳記投射，並以此自傳材料或

傳記投射，當成張學研究最終確切的依歸與判準。另一則是「一切皆文本」的基進版本，不是要「正本清源」，讓文學的歸文學，傳記的歸傳記，或讓經典的歸經典，八卦的歸八卦，而是視所有的「自傳」皆「字傳」，皆「生命—書寫」，文學是文本，傳記也是文本，經驗也是文本，時代也是文本，「文本之外無他」(*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沒有在流變、摺曲、歧異之上或之外的不變「自我」、固著「經驗」或本然「生命」。

如是觀之，張愛玲「本名」張愛玲，誰說不是一句至為弔詭不當的話語。

(責任校對：李育憬、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許慎 Xu Shen 撰，徐鉉 Xu Xuan 校定，陳昌治 Chen Changzhi 刻本，《說文解字》*Shuowen jiez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3。

二、近人論著

王泉根 Wang Quangen，〈《華夏取名藝術》*Huaxia quming yishu*〉，臺北 Taipei：知書房 Zhi shufang，1992。

王慶淑 Wang Qingshu，〈《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Zhongguo chuantong xisu zhong de xingbie qi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5。

宋以朗 Roland Soong，〈《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Song Qi chuanqi: cong Song Chunfang dao Zhang Ailing*〉，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2014。

_____，〈張愛玲美國長者卡、公民入籍證照片曝光（圖）〉“Zhang Ailing Meiguo zhangzhe ka gongmin rujizheng zhaopian puguang (tu)”，<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9-26/2555311.shtml>，2020年4月20日下載。

林式同 Lin Shi-tong，〈有緣得識張愛玲〉“Youyuan deshi Zhang Ailing”，收入蔡鳳儀 Tsai Feng-yi 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Huali yu cangliang: Zhang Ailing jinian wenji*，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6，頁 9-88。

周作人 Zhou Zuoren 著，止庵 Zhi'an 校訂，《苦茶隨筆》*Kucha suibi*，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2。

洪喜美 Hung Hsi-mei，〈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Wusi qianhou feichu jiazuzhi yu feixing de taolun”，《國史館學術集刊》*Guoshiguan xueshu jikan*，3，臺北 Taipei：2003，頁 1-30。doi: 10.7058/BAH.200309.0001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 Huangguan chubanshe bianjibu，〈代序〉“Daixu”，收入張愛玲 Chang Eileen，《餘韻》*Yuyun*，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1，頁 3-6。

韋泐 Wei Yang，〈聽沈寂憶海上文壇舊事〉“Ting Shen Ji yi haishang wentan jiushi”，<https://whb.cn/zhuzhan/bihui/20150731/34556.html>，2019年8月23日下載。

- 夏志清 Hsia Chih-ting 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Zhang Ailing gei wo de xinjian*，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 wenxue，2013。
- 高全之 Kao Chuan-chih，《張愛玲學》*Zhang Ailing xue*，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2011，〈張愛玲的英文自白〉“Zhang Ailing de Yingwen zibai”，頁 405-414。
- 張子靜 Zhang Zijing，《我的姊姊張愛玲》*Wo de jiejie Zhang Ailing*，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1996。
- 張守中 Zhang Shouzhong，《方北集》*Fangbei ji*，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美術出版社 Hebei meishu chubanshe，2014。
- 張愛玲 Chang Eileen，《流言》*Liuyan*，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1。
- _____，《秧歌》*Yangge*，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1。
- _____，《續集》*Xuji*，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3，〈自序〉“Zixu”，頁 3-7。
- _____，《對照記：看老照相簿》*Duizhao ji: kan lao zhaoxiangbu*，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1994。
- _____，《張愛玲典藏全集 14：情場如戰場等三種》*Zhang Ailing diancang quanji 14: qingchang ru zhanchang deng sanzong*，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2001。
- _____，《小團圓》*Xiao tuanyuan*，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2009。
- _____，〈愛憎表〉“Ai zeng biao”，《印刻文學生活誌》*Yinke wenxue shenghuo zhi*，155，臺北 Taipei：2016，頁 2-33。
- 張愛玲 Chang Eileen、宋淇 Stephen Soong、宋鄭文美 Soong Kuang Wenmei 著，宋以朗 Roland Soong 主編，《張愛玲私語錄》*Zhang Ailing siyu lu*，臺北 Taipei：皇冠文化 Huangguan wenhua，2010。
- 曼 廠 Man Chang，〈三個張愛玲〉“San’ge Zhang Ailing”，收入肖進 Xiao Jin 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Jiuwen xinzhizhang Ailing*，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9，頁 61。
- 符杰祥 Fu Jiexiang，《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Guozu misi: xiandai Zhongguo de daode lixiang yu wenxue mingyun*，臺北 Taipei：秀威經典 Xiuwei jingdian，2015。
- 陳子善 Chen Zishan，《張愛玲叢考》*Zhang Ailing congkao*，北京 Beijing：海豚出版社 Haitun chubanshe，2015。

- _____，〈張愛玲用過哪些我們所不知道的筆名？〉“Zhang Ailing yongguo naxie women suo bu zhidao de biming?”，<https://cul.qq.com/a/20150621/007509.htm>，2018年8月20日下載。
- 陳建魁 Chen Jiankui，〈《中國姓氏文化》*Zhongguo xingshi wenhua*，鄭州 Zhengzhou：中原農民出版社 Zhongyuan nongmin chubanshe，2008。
- 陳象恭 Chen Xiangong，〈《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Qiu Jin nianpu ji zhuanji zil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陳慧文 Chen Hui-wen，〈廢婚、廢家、廢姓：何震的「盡廢人治」說〉“Feihun, feijia, feixing: He Zhen de ‘jin fei renzhi’ shuo”，收入丁乃非 Ding Naifei、劉人鵬 Liu Jen-peng 編，〈《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Zhiyi hunyin jiating lianxuti*，新北 New Taipei：蜃樓出版社 Shenlou chubanshe，2011，頁 69-90。
- 單德興 Shan Te-hsing，〈《翻譯與脈絡》*Fanyi yu mailuo*，臺北 Taipei：書林出版 Shulin chuban，2009，〈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Hanying tuhua: yizhe Zhang Ailing: xilun Zhang Ailing de Meiguo wenxue zhongyi”，頁 159-203。
- 馮祖貽 Feng Zuyi，〈《百年家族：張愛玲》*Bainian jiazhu: Zhang Ailing*，臺北 Taipei：立緒文化 Lixu wenhua，1999。
- 翟同祖 Zhai Tongzu，〈《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Zhongguo falü yu Zhongguo shehu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2。
- 趙瑞民 Zhao Ruimin，〈《姓名與中國文化》*Xingming yu Zhongguo wenhua*，海口 Haikou：海南人民出版社 Hainan renmin chubanshe，2008。
- 劉人鵬 Liu Jen-peng，〈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Wan Qing huijia feihun lun yu qinmi guanxi zhengzhi”，〈《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5，新竹 Hsinchu：2011，頁 231-270。doi: 10.6466/THJCL.201106.0231
- 劉以鬯 Liu Yichang 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Xianggang duanpian xiaoshuo xuan (wushi niandai)*，香港 Hong Kong：天地圖書 Tiandi tushu，1997。
- 蕭遙天 Seow Yeoh-thian，〈《中國人名的研究》*Zhongguo renming de yanjiu*，臺北 Taipei：臺菁出版社 Taijing chubanshe，1969。
- 靜冬 Jing Dong，〈漫談豐潤張家〉“Mantan Fengrun Zhang jia”，〈《燕趙都市報》*Yanzhao dushi bao*，2014年7月13日，第3版。
- Bennington, Geoffrey and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3.

- Derrida, Jacques. *Acts of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_____. "The Battle of Proper Names," in Julian Wolfreys (ed.), *The Derrida Reader: Writing Performances*.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pp. 74-87.
- _____.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 _____. *Glas*, trans. John P. Leavey, Jr. and Richard Rand.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 Peeters, Benoît. *Derrida: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2013.
- Powell, Jason. *Jacques Derrida: A Biogra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 Spivak, G. C. "Glas-Piece: A Compte Rendu," *Diacritics*, 7.3, 1977, pp. 22-43.
- Stocker, Barry. *Jacques Derrida: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Wakeman, John (ed.). *World Authors 1950-1970: A Companion Volume to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New York: H. W. Wilson, 1975.

Eileen Chang as Proper Name

Chang Hsiao-hu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ng@nt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proper name” of Eileen Chang 張愛玲 by mapping out the delicate fabrication among Chang Ying, Chang Yun-ying, Chang Ailing, Chang Meng-Yuan, Eileen Chang, Eileen A Chang, and Eileen Chang Reyher. It will bring in two lines of critique on the naming system. Firs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naming tradition will demonstrate how the legitimacy, authenticity, and propriety of clan patriarchy are solidifi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atronymy, generation names, male-centered pedigree, etc. Second, a deconstructionist critique of the “proper name” will help to reflect upon the “self-sameness” perpetuated by the “proper name” on the one hand and destab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y the “life-writing” to come. “Eileen Chang” as the name, the proper name, and the signature can thus be rea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critical lines to expose the possible subversion from cultural heritage to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origin,” “the rectification,” “the orthodoxy,” and the “propriety” that help to establish the ultra-stable hierarchy.

Key words: clan patriarchy, generation name, patronymy, feminism, d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9. 5. 2；修正稿日期：2019. 8. 19；通過刊登日期：2019. 11. 25)

